

倪国雄 万方 等编

中外书摘精华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外书摘精华

倪国雄 万方 等编

〔湘〕新登字002号

中外书摘精华

倪国雄 万方等编

责任编辑：任志伊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插页：2

字数：233,000 印数：1—10,000

ISBN7—5404—1333—6

I·1069 定价：7.1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并负责调换

目 录

中日建交谈判纪实	1
我参加了中德建交谈判	11
中国援越内幕	17
腾飞前的蹒跚	28
1969：核阴影下的中苏美牌局	42
开国大典秘闻录	59
万米高空的“外交战”	67
丛林中的共和国秘使	74
南越丛林中的一次营救行动	90
北京：中印战争前的运筹帷幄	96
定陵洞开后的风风雨雨	106
西周编钟盗窃案始末	126
“8·10”行动：团体黑势力覆灭记	138
以色列的第一次“特别行动”	151
突袭沙德万岛始末	161
危及11位部长的大绑架案	165
斯韦亚瓦根大街的枪声	172
世界上 最 残忍的一次集体大屠杀	181
“海基会” 号的秘密使命	198
美国的一次空前“大扫黄”	208
苏联出兵阿富汗内幕	216
我采访了安德罗波夫逝世的新闻	221
密谋下的专家掠夺战	231

一起神秘的工业间谍战	241
赵氏遗产案的前前后后	249
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截听战	265
震惊西方的施莱耶事件	271
日本“信浓”号航空母舰击沉记	288

中日建交谈判纪实

在外交上采取了必要措施之后，田中首相于1972年9月25日启程前往北京。当天，警视厅为防止右翼采取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恐怖行动，出动2500名机动队员，在沿路和机场上严密警戒。

田中首相乘坐的专机于当天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机场。

专机在跑道规定的位置上停稳后，舷梯靠了上去，并铺上了鲜红的地毯。不一会儿飞机打开舱门，田中首相从机舱里走了出来。他身穿深灰色西服，系一条素色领带，缓步走下舷梯。身着灰色中山服的周恩来总理迎上前去，紧紧握住田中的手。

解放军军乐团奏起《君之代》和《义勇军进行曲》。接着，两国首脑检阅了仪仗队。

欢迎仪式结束后，田中和周恩来乘坐插有两国国旗的中国一流高级轿车“红旗”，由庞大车队护拥着驶往迎宾馆。

当天下午7时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主持欢迎宴会。宴会盛况空前，包括中方人员在内，出席宴会的共600多人，超过了尼克松访华的时候。菜单上有莼菜（草木睡莲的茎）、炖鱼翅、对虾、冬菜豆腐、北京烤鸭、八宝饭、甜点和九种水果。

在周恩来致欢迎词之后，田中站到了话筒前面。他提到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他说：“两国……有着长达两千年丰富多采的交

往的历史。”接着他说：“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讲到这里，刚才还在鼓掌的中方人员听到“添了麻烦”这句话，一下子静了下来。会场上热烈的欢迎气氛突然变了样。

第二天，周恩来见了田中，对他进行了严厉批评，说：“在昨天的晚宴上，田中首相讲‘添了麻烦’。这句话好像是弄湿了过路女人的裙子，向人家道歉似的。”

中国方面觉得，日方为了侵略大陆接连发动了满洲事变、日华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用这样一句话表示道歉太轻描淡写。不过田中致词结束的时候，中国方面还是报以热烈的掌声，给他圆了场。

二

9月26日。从上午10时15分到中午，首先由大平外相和姬鹏飞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厅举行第一轮外长会谈。

这是起草日中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实质性会谈。出席这次会谈的人员，日方除大平外，还有吉田健三亚洲局长、高岛益郎条约局长等共9人；中方有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外交部顾问张香山等6人。

日方当时出席这次会谈的某位人士后来回忆说：“首相访华时，外务省准备了三个方案。日方准备在举行外相第一轮会谈时，无保留地把日本的意见全部摆出来，席间，高岛条约局长对第一方案做了说明。”第一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三个。

第一是结束战争状态问题。日本政府认为，根据日华和平条约，与中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因此，在联合声明中没有必要再提结束战争状态问题。假如中方坚持要提结束战争状态问

题，可采取由中国政府单方面宣布结束战争状态的方式。

第二是复交三原则分开的问题。三原则的第一条，中方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点，日本政府可以承认。第二条，“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理解并尊重中国的这一立场。第三条，“日华条约是非法的，也是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这一点，比较难办。日本政府不能倒退到当初签订这项条约的时候，宣布这项经过正式手续缔结的条约无效。因此，要日本政府“理解并尊重复交三原则”是不合适的。所以，复交三原则要分开。第一条和第二条可以写进联合声明，第三条不要写进联合声明。处理的办法是由日本政府通过别的途径来表示这个意思。

第三是联合声明增加一段前言的问题。

日方早就料到中方必将坚决反对这些说明。但是，日方为了本国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无论如何不能让步。

为此，高岛条约局长搬出条约理论，批驳中方的主张。高岛是1941年进入外务省的资深外交官，精通条约理论。他性格刚强，在谈判桌上向来寸步不让。外务省于1972年1月把高岛从驻悉尼总领事的职位上调回国内，放在条约局长的位子上。采取这种人事措施，显然认为高岛在强手中国面前也绝不会后退。

高岛阐述了日本的立场，并针锋相对批驳了中国的方案。他一个劲儿往下说，在座的中方人员脸色变得很难看。会谈不欢而散。

下午2时。田中和周恩来举行第二轮会谈。周恩来与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口气谴责了日本的态度。他说：“听了今天上午外长会谈的汇报。高岛条约局长是破坏日中邦交正常化来的吧。日中邦交正常化是个政治问题，不是法律问题。我不认为高岛局长的意见是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本意。”

看到周恩来如此气势逼人，田中也豁出去了，顶了他一句：

“不。这不是高岛个人的意见，是日本政府的意见。”周恩来未加理睬，话锋一转谈到了头天晚宴上田中的致词，对“添了麻烦”的说法进行批评。田中不买帐，说：“日本可不是这样。你说没关系，我给你深深鞠个躬，说声‘实在给您添了麻烦，以后我注意’，就完了。”

接着，双方展开舌战，你来我往足足谈了两个半小时。后来才明白，周恩来当时采取的是中国惯用的外交手段。把对方谈判代表中某人说成“坏蛋”，彻底搞臭。这样，对方内部发生分裂，“坏蛋”被孤立，主张妥协的意见开始抬头，形势就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当时，日本是第一次同中国打交道，所以总是受中国摆布。

对日方来说还有一件事很棘手。10月1日是中国的国庆节。田中首相一行无论如何要在这之前离开北京。就是说，谈判不能拖。然而从自民党党内的情况讲，田中访华，说什么也不能让谈判告吹，空着两只手回国。如果谈判破裂，很可能在党内受到追究，导致内阁总辞职。从中方态度严厉的情况看，要想完全按日方的主张办似乎很难。第二轮首脑会谈结束后，日本代表团回到迎宾馆，人人显得心情沉重。

这时，田中开了口：“怎么啦？总得吃饭嘛。”大平、二阶堂、桥本中国课长等人紧跟在田中身后，走进与首相卧室只隔着一间房的食堂。

由于谈判触了礁，所以谁也不说话。为了给大家打气，田中又开了腔：“你们用不着担心。成就成，不成就不成，到时候我负责。党内，你们不必担心，我有办法。这行了吧？”

不论大平还是高岛，都没有心思拿筷子。只有田中一人往嘴里夹菜，咂巴咂巴吃得挺香，还不时地呷上一口茅台。

三

吃完饭，大家把田中送回卧室，随后又到大平卧室开会研究，逐条对联合声明的初稿进行仔细推敲。

晚上，为了确切了解中方的意图，临时商定大平和姬鹏飞再次举行会谈。姬鹏飞过去是八路军军医，为人诚恳。这一点在同大平的交往中也能看出来。他脸上笑咪咪的，给大平留下的印象很亲切。大平觉得“像他这样的人是会体谅我们的苦衷的”，于是他结结巴巴地一再解释日本的立场，同时打听中方的想法。

高岛同外交部顾问张香山进行了接触。张香山是中国共产党内地位仅次于廖承志的日本问题专家，据说战争结束前毕业于东京高等师范，日语讲得很流利。他处事慎重，反应很快，你刚说完，他马上就能做出确切的回答。高岛就外长会谈中没有讲透的问题做了详细说明。日方根据从姬鹏飞、张香山等人那里得到的感触，开始起草妥协方案。

在日方采纳的对方的意见中，有一条是“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当初，日方觉得“既然有了联合声明，就可以不再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了”。但周恩来在举行第二轮首脑会谈时提出：“田中先生，这不单是为了你我友好下去，而是为了中日两国子子孙孙和平友好下去。”

然而，和平友好条约究竟写些什么？在日中首脑会谈的谈判桌上，中方从来没有谈过明确的想法。所以，日本代表团中有人特地采访了廖承志和张香山。他说：“在50年代中国与印度等邻国缔结的睦邻友好条约中，都写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看来也得写这个内容。”“是啊。”张香山回答。

起草妥协方案的工作，直到当天深夜才完成。高岛把妥协方案的基本内容整理成若干条，于次日上午交给了大平。

四

9月27日。从清早起天空就布满了厚厚的云层，而且刮着阵阵狂风，似乎预示着谈判的前途严峻。但是田中首相一行还是按照中方安排的日程，于上午8时许离开迎宾馆，由姬鹏飞陪同前往万里长城游览。

然而，负责谈判具体事务的大平外相此刻没有心思游览。他和姬鹏飞同乘一辆车向万里长城驶去。在车上，他把高岛起草的日方妥协方案要点交给姬鹏飞并对他说：

“这是日本的最后方案。”

中方会做出什么答复？必须做好思想准备，谈判有可能破裂。如果谈判破裂，势必影响田中内阁的存在。一路上，大平想了许多。到了长城，步子都要迈不动了。田中走路很利索，把大平甩得好远。

下午4时1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始第二轮会谈。事先，日本的妥协方案已通过姬鹏飞送到周恩来手里。

周恩来对妥协方案点不点头，将是田中访华成败的关键。田中也好，大平也好，都想从周恩来的表情猜测会谈的命运，但很难从他的脸上看出谈判的前途是凶是吉。田中又一次感到“周恩来实在高明”。

在田中到达中国当天的晚宴上，周恩来一再给田中的盘里夹菜，脸上总是笑嘻嘻的。第二天举行第二轮会谈时，却和前一天判若两人，以严厉的语气批驳了高岛条约局长的说明，浑身充满了中国寸步不让的气概。

今天，周恩来笑容可掬，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他的眼睛没有笑。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使人感到几分畏惧。会谈进行了两个小时。会谈中，周恩来一句不提日本的妥协

方案。

会谈结束后，日方参加会谈的人员终于恍然大悟：“周恩来是在等什么人最后拍板。”周恩来请示的不是别人，肯定是毛泽东。毛泽东会做出什么反应，大家非常担心。

田中、周恩来第三轮会谈结束，日方代表在迎宾馆用餐，礼宾司长韩叙前来通知中国课长桥本：“下午8时或9时，毛泽东主席准备会见田中首相。”

田中等人正准备前往，周恩来未经预告突然来到迎宾馆，随后亲自陪同田中他们前往中南海毛泽东私邸。时间将近8点30分。

乍看起来，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年轻些，谢顶，后脑勺上白头发很密。会见时，毛泽东说：“上帝快要我去报到啰。”但是田中丝毫没有看出毛泽东身体不好。

“打架打完啦？不打不行啊。”

“不，我和周总理谈得很好。”

“不打不成交嘛！”

“是的。”

毛泽东说话幽默，十分健谈，讲着讲着讲到了书斋里的藏书。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套《楚辞集注》六卷，作为礼物送给田中。他说：“我喜欢读书，知道对身体不好。不读，睡不着觉。”

会见用了一个小时，谈了不少题外话。田中回国后，10月1日在东京小平市的高尔夫球场打高尔夫球，中间吃午饭的时候对记者们披露了当时的一段插曲。田中介绍说：“毛泽东还议论了一番台湾的蒋介石总统，说：‘这个人了不起。他做事情从不半途而废，绝对不会把军队交给其他国家的。’”

毛泽东会见田中这件事本身，以及毛泽东对田中的友好态度，清楚说明毛泽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开了“绿灯”。三人回到迎宾馆后，日本代表团其他成员听说了与毛泽东会见的情况，一个个情不自禁地高兴起来。

五

晚上10时10分，大平和姬鹏飞两位外长在迎宾馆会谈。大平逐条宣读日方的草案。姬鹏飞和张香山一一记了下来。中国外交部两名工作人员轮流拿着他们的记录走出房间。大概是把记录的内容送交周恩来。

片刻，工作人员回到座位上，交给姬鹏飞一张字条。姬鹏飞看后说话了，开始宣读中方的答复。

日方当时参加谈判的一位当事人，后来向笔者描述了当时精彩的场面。他说：“真是迎刃而解。中方对日本的妥协方案做出全面让步。”

中方原来坚持要用“结束战争状态”这几个字。周恩来出了个主意，只是措词上做些调整，改成“结束不正常状态”。这样，日方就不用再一次宣布“结束战争状态”了。

中方还放弃了“把复交三原则一起写在联合声明正文里”的主张，同意把这三条原则分开来表述。这就是说，中方默认了日华条约的有效性。

中方为什么这样痛快地接受日本的主张呢？这说明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了完善对苏战略，急着要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既然日本已经同意增加霸权条款，答应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给田中一份“人情”，见好就收是上策。

不过，中方最终提出两点要求：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要在联合声明前言后半段里提一笔。”

“中国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到底怎么办，想听听大平外相的高见。”

大平拿起铅笔，在已经打印好的日本方案上改写了联合声明

前言的后半部分。最后写成：

“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1982年夏天，中国正是依据这一条指责日本审定历史教科书“违反中日联合声明”。

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赔偿的权利这一条，大平根据条约局的意见做了改写。最后是这样表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

大平删掉了中方一直坚持的“要求权”的“权”字，随后把稿子交给了中国方面。中方看了后，同意了。这样，双方围绕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在法律上出现的分歧，一一得到了解决。

六

9月28日下午3时40分，田中和周恩来在迎宾馆举行最后一轮会谈。这次会谈没有特别需要讨论的问题。会谈非常顺利，只用了50分钟就结束了。

下午6时30分，由田中首相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宴会。这是为周恩来总理25日宴请田中首相一行而举行的答谢宴会。

现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就等着签署联合声明了。周恩来总理举行欢迎宴会时那种紧张心情已经消失，会场上气氛友好，到处都能听到人们的欢声笑语。

每一张餐桌上，都摆着九谷瓷酒杯。这是田中首相赠给每一位宴会来宾的礼品，酒杯里斟满了田中家乡新潟县出产的名酒。而“干杯”时，周恩来“干”的还是茅台。

宴会后，田中首相站起身来，陪同周恩来退场。两人离开会场时，全场鼓掌。田中转过身来用刚刚学会的中国话连声说“再见，

再见”。

这是田中一生中最得意的时刻。

(顾汝钰译 任摘)

我参加了中德建交谈判

我于1969年12月到联邦德国首都波恩担任新华社常驻记者。在我到那里之前三个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与自由民主党组成了联合政府，使自1949年以来执政了20年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第一次成为反对党。

社民党总理勃兰特改变过去连盟党执行的僵硬的东方政策，推行新东方政策，承认战后现实，改善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关系。但当时，社民党政府非常担心同中国发展关系将会影响它推行新东方政策，影响它同苏联和东欧各国改善关系，因此自上台以来，除了在它的外交政策声明中简单地提到中国之外，在所有的声明、讲话中都不提同中国的关系。反对党就在这个问题上给政府出难题，认为东方政策应该把中国也包括在内。

在1971和1972年之间，我国内外一系列重大事件，包括中美“乒乓外交”、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我国同更多国家建交、尼克松访华等，在联邦德国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对党领导人和报刊更是公开主张发展同中国的关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副主席、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施罗德在1971年中和1972年初两次对记者发表谈话，表示愿意到中国来同我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意见。基督教社会联盟主席施特劳斯也对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要同中国发展关系，“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并且提出，政府的东方政策不应终止于莫斯科，而要延伸到北京。

1972年4月中，我在罗马尼亚驻联邦德国大使的招待会上遇到

施罗德，问到他曾两次对记者表示愿意去北京同中国领导人就两国关系进行商谈的事。他说招待会人太多，不便多谈，他很愿意约我到他在议会的办公室去详谈。大约十多天后，即5月初，他的秘书来电话约我前去。施罗德在过去联盟党政府中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等重要职务，富有外交经验。他同我谈了大约两个小时，从国际形势、西欧局势谈起，直到最后才谈到愿意在夏季访华。我表示将尽快报告国内，一有答复立刻告诉他。第二天，我就去我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将此事报告外交部。我感到，社民党政府只考虑到同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谈判，对同中国发展关系并不积极，现利用邀请反对党政治家访华可能对政府有推动作用；而且施罗德在国内声望较高，又有议会外交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对我较为方便，也不会太得罪执政党，因此建议国内邀请施罗德尽快访华。两个星期后，外交部答复由外交学会邀请施罗德在7月份内访华两周。

施罗德受到邀请之后非常高兴，当天即向报界作了宣布，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应和注意。在动身之前，施罗德专门拜访了勃兰特总理和谢尔外长，就两国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

施罗德夫妇在7月15日到达北京。他同当时的外交学会会长、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同志进行了四次会谈，最后达成了一个书面文件，双方认为两国早日建立外交关系是可取的，这方面没有任何困难。在他7月20日离开北京到外地访问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他对周总理说：“我给您带来了联邦德国的最美好的祝愿。”周总理笑着说：“我感谢你带来了好雨。”那些天北京久旱未雨，在接见之前正好下了倾盆大雨。周总理问他这些天来参观了什么地方，他说故宫和长城。周总理又问他在长城上爬到了什么高度，他说爬到了最高的顶上。周总理赞许地说：“那你比尼克松高出了一倍，比上星期来访的法国外长舒曼也高出了不少。”周总理在谈到他20年代初去过德国并且问到波恩和科隆的